

THE DEVELOPMENT WAY OF POST-WAR ECONOMIC

India

世界主要经济体战后经济发展丛书

丛书主编 李炜光

सत्यमेव जयते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

印度篇

董磊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THE DEVELOPMENT WAY OF
POST-WAR ECONOMIC
India

世界主要经济体战后经济发展丛书


丛书主编 李炜光



战 后 经 济 发 展 之 路

印度篇

董 磊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印度篇/董磊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5141 - 3442 - 1

I. ①战… II. ①董… III. ①经济发展 - 研究 - 印度 - 现代 IV. ①F113. 4②F135.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06772 号

责任编辑: 王冬玲

责任校对: 郑淑艳

版式设计: 代小卫

责任印制: 邱 天

战后经济发展之路——印度篇

董磊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10 × 1000 16 开 19.5 印张 320000 字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3442 - 1 定价: 43.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02)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大成果之一，我以为首先不是 GDP 增长了多少和福利有多大的改善，而是计划经济这种发展模式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施政选项中排除，不是计划经济的设计本身有多大错，而是凭人类目前的智慧和能力做不到。从客观效果上看，这种集权型的经济体制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损害也委实太大。尽管在一些转型国家，计划体制的思维仍在，体制仍有回潮的可能，但已构不成现实的威胁。

对于计划经济，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在其著作《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的概括是：“计划的整个综合思想，就本质而言，在方法上是理性主义的，结论上是国家干预主义的。”计划经济不相信自然演进，相反，它把各种资源和要素统统“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便经济体系能依照有目的地制定且合理协调的政府政策朝着其所要求的方向运动。”保罗·萨缪尔森甚至一再预言，苏联的计划经济将会超过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历史给出的结论却是，自由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加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繁荣和自由。计划经济的两个大本营——苏联和中国也都先后放弃了这个过于理想化的体制，转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人类深刻反省自己的发展道路而得出的经验和结论。

战后世界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并极大地造福于人类，首先应归功于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制度。联邦德国

只用了10年不到的时间，就将这个因战败而被彻底摧毁的国家建成欧洲大陆上最强有力的经济体，就是市场经济所创造的奇迹。中东地区的以色列，虽然对经济实施了较广泛的干预，但因为保留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和更多的政治自由，经济发展的情况就要比邻近地区的其他国家更好，如埃及。在远东地区，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也都因广泛地依靠私人市场来发展经济而保持了长时间的繁荣。印度声称废除种姓制度的藩篱，在实践中却进展甚微，但那里还是成批地产生优秀的企业家，特别是政府管制较弱之处，他们成为促进这个难以进步的国家的推动力量。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形也大致如此，经济自由和人类自由的有无和空间大小，政治权力是不是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从根本上决定着那个地方的经济和社会是繁荣，还是凋敝；是发展，还是蹒跚倒退。

尽管有长时间的市场经济实践，西方学界内部关于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问题的争论至今仍然辩驳不清。战后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综合起来看，实际上就是一段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相互碰撞的历史，争论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两种经济思想进行的。两大辩手哈耶克和凯恩斯分别给出答案，前者是个体自由的捍卫者，认为政府干预市场越频繁，对市场的伤害就越大，“政府应该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后者则认为，政府干预就像是给一部轰轰作响的机器加注润滑油，所以只有对市场进行有效干预，才能使它运转得更加良好。这场争论绵延甚久，改变政府过度干预的政策实践也颇费周折。2007年以后，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的轮番大战再度上演，甚至蔓延到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但自由市场经济这一派并未明显占据上风。几十年来，各国国民收入中用于政府开支的份额一直没有明显下降，有的国家甚至还有所上升。如弗里德曼所说：“控制我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政府管制活动，仍然杂芜繁多，并没有多少松动的迹象。”

对凯恩斯主义的否定为何如此不易呢？这是因为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全球经济严重倒退，给整整一代人带来恐慌。这以后，扩大政府职能的主张便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可，也引发了政治和法律层面的变化，其标志性事件是 1946 年美国《就业法》的颁布，联邦政府被赋予了更多的管理经济的职权，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限制产量，把农产品价格人为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在这以前，尽管人们已经认识到市场体系常会发生运行不畅的问题，多数经济学家仍把这种波动归于正常范围，认为经济体系能够自我纠错，就像一个人得了感冒，依靠自身机体的抵抗力也能痊愈。人们产生这种自信是有根据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在 19 世纪末的时候，政府的权力已经受到制度的严格限制，几乎不能集中起什么像样的作用，已威胁到普通公民的财产和人身权利了。而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仿佛一切又都回去了，国家建构的努力似乎白费，就像回放一部黑白默语片。

与众不同的凯恩斯，不认为经济体是一个能够自我约束的系统，这个系统是不能“自然而然”地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里去的。在他的理论推导中，自由市场经济就像一艘海面上行使的船，船舵已然出现破损，海风的吹打使它左右摇摆，已无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平安抵达彼岸。他给出的方案是，在经济衰退期，政府应该大规模借债以提升总需求，并在他的新经济理论中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是恰当的。他尤为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加大投资——架桥修路，或减税，或给家庭直接增加购买力，来提升对商品和货物的需求，进而引导企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

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用于分割的“大饼”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多支出 1 美元，居民就会少消费 1 美元。而在凯恩斯学派看来，当私人投资支出过低时，政府就应该用自己的财政支出来替代它。政府额外支出 1 美元，会把大饼做得更大，从而同时增加

政府和居民两者的可支配收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的年代里，政府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扩张正巧与美国经济大萧条的紧迫局面相合，凯恩斯的灵丹妙药促使经济体从低谷迅速反弹，失业率应声下降到历史的低位上，人均产出最终回到了大萧条之前的水平。这正是凯恩斯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这个理论并不复杂，但实用性极强，更主要的是，它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很多从来难以撼动的定论，并且影响深远。人们转而认为，大萧条的爆发是自由市场经济失败的结果，他们如此轻而易举地丢弃了本属于自己的自由经济。公众和知识分子对政府与个人之间相对责任的认识最终改变了政治运作结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1965年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说道：“现在，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如今，凯恩斯的影响力已远不如从前，但也不能否认，他们还有力量。

最近的一次争论发生在蔓延世界各地的本轮金融危机期间，如以往发生的那样，这一次的争论也渗入到政治领域的高层。2008~2009年间，法国总统萨科奇、英国财政大臣达林和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仍在依据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的合理性，尽管在此前20年左右的时间里，这一理论的影响力已经有所下降了。在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奇和德国总理安杰拉·默克尔之间甚至发生了一次公开的争执，萨科奇坚持认为，如果经济陷入泥潭，大量财政赤字是可以接受的。在德国，2009年6月通过了一项平衡财政预算的法案，企图将公共债务减少到零。美国的一些对奥巴马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则认为，政府并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而是问题本身。

凯恩斯主义有顽强的生命力，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迷失了道路”。实际上，这一理论在战后就逐渐暴露出其缺陷。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因陷入越南战争而难以通过增税来获得财政收入，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加借债来支付军费。凯恩斯主义者的预期是，这些预算赤字将首先推动充分就业，然后引发通货膨胀。然而事

实却是，赤字预算政策并没有推动失业率下降，它只是推高了物价水平。1975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9%，而通胀率则高达13%。这就是著名的“滞胀”，这种高通胀与高失业率同时存在的经济现象与凯恩斯理论相矛盾。至少在整个70年代，凯恩斯式的财政政策是失效的，其失败的方式与大萧条时期的经验数据是一致的。这是80年代古典经济学全面回归、由美国引领的全球性大减税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大萧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企业不能生产出足够的产品来维持社会充分就业水平，失业者则失去购买商品的能力。凯恩斯认为，总需求主要取决于人们的收入水平，但学者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消费行为的研究，发现这一假设是不对的。事实上，人们是根据自己拥有的财富水平来决定应该花多少钱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弗里德曼曾以他的研究成果向人们证明了这个道理：收入的暂时性波动对消费只有次要的影响，真正重要的是“永久性的收入”，即居民的财富。财富才是决定商品和就业数量的关键因素。当财富数值下降并较为长期地保持在低水平上的时候，居民就很可能削减自己的消费，于是商品和服务的总需求也就下降了。这个理论对于判断一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有着重要影响。2008年以后，凯恩斯的“幽灵”又一次在世界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上空徘徊，许多经济学家仍然相信恢复充分就业最有效的解决方案仍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种观点引导着各国的各级政府一次次地大量举债，它所带来的高额成本，换来的只是一时的增长，却使得我们的子孙后代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者说，相当于后世的税收都被我们这一代人“预征”了。

凯恩斯主义有问题，并不是说古典经济学就十全十美。当离我们最近的这次金融危机降临的时候，古典经济学家对危机的形成原因和治理之道的解答，看上去是如此的无助和无力。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大选时说“经济的基本面是健康的”，立即被奥巴

马抓住并受到其激烈抨击。麦凯恩所依据的正是古典经济学的定义。然而他的话音未落，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经济就开始以令人担忧的速度下滑，并大量流失工作岗位，大批工人失业。实际上，在战后 60 多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有越来越强的趋势，但战后出现的 10 次经济衰退都没有超过最早的那次大萧条，大多数衰退持续时间都没有超过一年。如一些美国经济学家指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波动的程度比战前小了将近 4 倍，可见，几乎完全忽略成百上千万投资者的共同信心的因素，以及过分相信市场自我修复的功能而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这两者共同构成了古典经济学派面对经济领域新问题时所暴露出的缺陷。

尽管如此，在自由市场经济和政府干预经济这两者中，我们最好还是选择支持前者。因为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理由，经济自由都比经济被干预要珍贵得多。政治权力不能高于个体自由，以平等的名义也不行。有经济自由才会有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可保证人们之间相互合作，而不必依靠外部强制和命令，由此政治权力的领域便罕见地被市场所挤压，而变得相对狭小。其次，自由市场有把权力分散化的功能，即便出现某种政治集权，也容易被其“化掉”而难以在人间兴风作浪。值得庆幸的是，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仍然是挽救人类的强有力的手，其力量还可以抵御来自政府的那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和社会的削弱作用，克服其带来的恶果，只要我们坚持市场经济“100 年不动摇”。当然了，100 年以后更没有理由动摇。

经验表明，如果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中，则必然导致专制和暴政。一个一权独大为所欲为的政府，迟早会毁掉自由市场机制所带来的繁荣，葬送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弗里德曼夫妇说，“这一天的到来，也许比我们许多人所预料的要早得多。”在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人们也迟早会明白一

个有关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最起码的道理：一个被权力过度管制的社会蕴藏着怎样的危险。多少个世纪以来，对于人类最大的威胁并不是通常想象的战争和自然灾害，而是不受制约的权力。人们总是受其所害，却总是不能醒悟。

不管怎样的难，人类总还是有能力找到一种既能纠正市场经济的弊端和弥补制度的缺陷，同时保留自由市场经济的长处方案：既不限制个体自由和压制企业家创业与创新的热情，也不会导致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此为人类社会需长期面对的两难问题，人们要获得答案，只有不断探索。相比之下，我们对自己的了解要比对欧洲、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了解多得多，这妨碍了我们正确理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真谛，所以需要有人做研究和介绍的工作。

我的同事董磊所计划完成的这部《世界主要经济体战后经济发展丛书》，就是从战后国别经济发展史这个角度，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合理的政府干预的问题所做的有益探索。他是个有想法、有志向的年轻人，暑假在苏州一带旅行期间，他告诉我，为了写这本书，他每天要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材料汇总排列，对着它们冥思苦想，然后下笔写上几行。确实，战后近70年的历史波澜壮阔又丰富多彩，很多事件都极具启发性，都值得详加考证。由此可见他具备做学者的基本素质，那就是锲而不舍。如此坚持下去，我相信他必有收获，而且必有信仰蕴含其中。他一定会把事情做好的，所以我选择支持他。

李炜光

2012年8月19日

目 录

20 世纪 40 年代 艰难的新生

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不仅让欧洲列强各国元气大伤，更是点燃了世界各地被殖民地国家要求独立的热情。在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的带领下，印度人民以独特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形式开始了漫长的独立道路。随着《印度独立法》在 1947 年的颁布，印度终于结束了 200 余年的殖民地统治，但随之而来的印巴分治却将这片南亚次大陆带入了仇恨的泥潭。在失去了无数平民和“圣雄”甘地后，古老的印度终于迎来了民族独立的日子。

- 1945 年 回归的南亚钻石 1
- 1946 年 孟买兵变与临时政府成立 6
- 1947 年 被割裂的南亚钻石 9
- 1948 年 矛盾重重的国大党 14
- 1949 年 奠定方向 18

20 世纪 50 年代 多元的共和国

新生印度并没有在独立后呈现出“万众一心”发展新国家的姿态，在地方分权的联邦制政体下，一直以来都缺乏国家认同感的国民由于宗教、种族、语言等诸多原因没有选择团结在以尼赫鲁为“领袖”的国大党身边。正因如此，尼赫鲁也只能在与各个政治力量的博弈中缓慢地去实践带领印度成为“社会主义类型”国家的理想。虽然尼赫鲁并没有成为一个“雷厉风行”的政治家，但是重视教育的他却成了印度的“福泽渝吉”，他将自由的精神和追求自由的可能性留给了印度。

- 1950 年 多元的共和国 23
- 1951 年 “一五计划”与《工业发展和管理法》 27
- 1952 年 尼赫鲁时代 31
- 1953 年 徘徊的土地改革 36
- 1954 年 远见与现实 43

1955年	印度外交家	48
1956年	新经济模式	52
1957年	危机浮现	57
1958年	印度精英	61
1959年	问题重重的印度	64

20世纪60年代 第三条道路

经济发展的艰难和战争的失败将印度拖入了深渊，而尼赫鲁也在焦虑和劳累之中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国家与人民。尼赫鲁的去世让印度政坛出现了权力的“真空地带”，在这片真空地带中各种政治力量上演了争夺印度“后尼赫鲁时代”领导权的争斗。在几番较量后，尼赫鲁的独女——英迪拉成为“胜利者”，而印度的发展之路也在这位新“领袖”的影响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颇具“教主”风采的英迪拉将印度带入了一条永远都找不到出口的“死胡同”之中。

1960年	失去的十年	71
1961年	艰难起步的“三五计划”	76
1962年	大国梦碎	81
1963年	印地语？印度人？	86
1964年	短暂的后尼赫鲁时代	90
1965年	被拖垮的印度	95
1966年	英迪拉时代	99
1967年	摇摇欲坠的国大党与破产的“三五计划”	103
1968年	“绿色革命”	107
1969年	死胡同	111

20世纪70年代 社会主义类型的印度

在政治斗争中取得了胜利的英迪拉展现出了超越其前辈政治家的“果断”和“高效”，印度也由此在英迪拉的主观和武断中大步迈向了“社会主义”。但是，当印度人民经历了英迪拉和其政治接班人桑贾伊的“威权主义”政策后，他们用手中的选票告诉了英迪拉，“用自由换面包”是人民所不能够接受的。可惜，接替国大党的人民党也没有兑现其政治承诺，印度人民不得不在“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尴尬地选择谁有权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目 录

1970年	向左转	117
1971年	第三次印巴战争	122
1972年	黔驴技穷	126
1973年	“失败的”“绿色革命”	130
1974年	第一次石油危机	135
1975年	紧急状态	140
1976年	社会主义的“接班人”	145
1977年	走下神坛的国大党	149
1978年	无所作为的人民党	153
1979年	人民党与人民的宿命	157

20世纪80年代 孕育新生

英迪拉对议会控制权的失而复得让印度再次回归到“国大党时代”的轨道上，然而重回政治巅峰的英迪拉却永远地失去了她最器重的政治伙伴，她的次子——桑贾伊。桑贾伊的死让英迪拉不得不将对政治表现出极弱热情的拉吉夫推向了建立“尼赫鲁王朝”主角的位置。拉吉夫的出现为印度政坛带来了一丝久违的清风，而一直以来都被极度压抑的印度精英们则在拉吉夫改革政策的鼓舞下迸发出强大的活力。经历了近30年徘徊的印度也终于找到了其最适合的道路，印度经济的巨轮终于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1980年	悲痛的英迪拉与幸运的印度	161
1981年	“碎片化”的印度	165
1982年	牛刀初试	168
1983年	《技术政策声明》	172
1984年	血染圣地	175
1985年	初战告捷的年轻人	178
1986年	迈向信息时代	182
1987年	发展与公平	185
1988年	大国野望	189
1989年	拉吉夫的“七宗罪”与民主的“瓶颈”	192

20 世纪 90 年代 “悬浮议会” 时代

拉吉夫的遇害身亡削弱了尼赫鲁家族对印度政坛的影响，随之而来的“悬浮议会”时代也改变了印度由政客决定发展道路的“传统”，印度精英们终于迎来了主导经济发展的机会。伴随着拉奥市场化经济改革的进行和信息产业在全球的发展，印度私营企业和技术人员终于等来了大展宏图的机会。然而，精英群体的崛起并不能解决众多缺乏知识的普通印度人民的困境，在宗教、种姓矛盾的长期酝酿下，带有鲜明印度教色彩的印度人民党登上了历史舞台。

1990 年 “悬浮议会” 和种姓冲突 199

1991 年 变局 204

1992 年 改革 208

1993 年 经济好转与教派紧张 212

1994 年 失衡的教育与企业家的选择 215

1995 年 入世与全面金融改革 219

1996 年 短命的印度人民党时代 223

1997 年 遗孀出山 226

1998 年 印度人民党时代 229

1999 年 千年之机遇 233

21 世纪 起舞的巨象

中国成功“入世”让印度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而以“知识密集型”产业对抗中国“劳动密集型”则成了印度企业的主动选择，“世界办公室”和“世界工厂”也便成了印度和中国影响世界的不同方式。经济的快速增长虽然让印度成为让世界瞩目的“新兴增长极”，但是一直以来都无法调和的社会矛盾却并没有因经济的增长而缓和，“异教徒”之间的流血冲突让印度人民再次笼罩在“自相残杀”的悲痛之中。

2000 年 中国“威、机” 239

2001 年 “免费的午餐” 243

2002 年 人民“公敌” 247

2003 年 崛起中的信息产业 251

2004 年 挥之不去的家族 256

2005 年 农村！农村！ 260

目 录

2006 年	大国之梦	263
2007 年	印度力量	267
2008 年	避风港与毒瘤	271
2009 年	决战印度市场	275
2010 年	世界办公室	279
2011 年	阿三? 第三?	283
2012 年	展开的未来	287
参考文献		291
后记		294

20 世纪 40 年代

艰难的新生

两次残酷的世界大战不仅让欧洲列强各国元气大伤，更是点燃了世界各地被殖民地国家要求独立的热情。在甘地、尼赫鲁等国大党领导人的带领下，印度人民以独特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形式开始了漫长的独立道路。随着《印度独立法》在 1947 年的颁布，印度终于结束了 200 余年的殖民地统治，但随之而来的印巴分治却将这片南亚次大陆带入了仇恨的泥潭。在失去了无数平民和“圣雄”甘地后，古老的印度终于迎来了民族独立的日子。



1945 年 回归的南亚钻石

“国家都是由苦难中产生的。”

——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

印度——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位于南亚次大陆上的第一大国，先后经历了雅利安人、阿拉伯人、莫卧儿人的统治后，于 18 世纪成为英国殖民者手中的宝藏。200 余年的英国统治让印度成为英国所有海外殖民地中最重

要的一环，印度就如同英国女王皇冠中那颗“光明之山”钻石一般，散发着璀璨但却悲凉的光芒。

在英国殖民当局的统治下，印度成为英国最重要的原料生产基地和产品销售市场。随着英国在 20 世纪两次被拖入世界大战的泥潭，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印度逐步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海外生产基地，印度的经济发展也由此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

由于德国、美国等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被大大削弱，英国不得不开始调整对印度的殖民政策。同时，为了满足英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争需要，英印殖民政府采取了促进印度工业发展的方针。1916 年，英国殖民当局第一次任命了一个工业调查委员会，考察印度工业发展的潜力，并研究殖民当局可以采取的工业刺激政策。1918 年，委员会发表调查报告并提出两个基本建议：殖民政府应在工业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并发展印度当地的科技力量。

印度
度
篇

英国殖民当局根据这两条建议，开始着手发展印度本土工业，其主要措施有：建立工业部来协调和宏观管理工业发展；殖民政府各部门所需要的物品尽量在印度本地采购；提高进口税，1921 年商品进口税总税率提升到 11%，1922 年提升到 15%；对钢铁业、棉纺织业、造纸业、火柴业、制糖业等 9 个部门实行关税保护。英国采取保护印度本土工业的政策既有将印度发展成为新工业基地的目的，又有很大的程度是为了抵御美国、日本产品在印度市场上的销售。因为此时的美国、日本产品在印度市场上已经开始直接挑战英国产品，所以英国殖民政府希望借助提高进口关税为印度国内企业发展提供机会，进而利用印度自己的工业体系来与美国、日本企业竞争。正是由于这样的思考，除了上述获得关税保护的行业外，玻璃、水泥、采煤、毛纺织等英国企业依然保持着对欧美企业竞争优势的行业便没有获得保护政策的支持。在英印政府保护印度本土工业发展政策的刺激下，印度工业在 20 世纪初进入了快速发展期。英国和印度本土资本纷纷进入工业部门，1918 ~ 1919 年，在印度登记的公司数（包括英资和印资）为 2 789 个，实收资本 10.6 亿卢比；到了 1921 ~ 1922 年，公司数增加到 5 189 个，实收资本增至 23.05 亿卢比。^①

^① 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6 页。